

交大大讲堂 ①

2008—2009

产业经济前沿与热点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bjtu.edu.cn>

CCISR

交大大讲堂 ①

2008—2009 产业经济前沿与热点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在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交大大讲堂”高层学术讲座基础上推出的学术文集第1辑。其中收录的19篇文章,是陆续走进“交大大讲堂”的学术大师在讲座报告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完成的。内容涉及当前经济形势、金融危机、房地产业、物流产业、三农问题、工业经济、高速铁路、船舶工业、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诸多领域、不同层面的产业经济热点与难点问题,充分展示了大师们对我国经济的深入分析、精辟阐释和独到见解。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8~2009 产业经济前沿与热点/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11

(交大大讲堂; 1)

ISBN 978-7-81123-903-4

I. ①2… II. ①北… III. ①产业经济学-文集 IV. ①F06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3067 号

责任编辑:解 坤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100044

印刷者: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43 印张:16.25 字数:38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3-903-4/F·533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对您的意见和批评,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投诉电话:010-51686043, 51686008; 传真:010-62225406; E-mail: press@bjtu.edu.cn。

序

自2009年的初春开始,部分勇于直面经济现实、勤于思考世情国情的学者走进北京交通大学“交大大讲堂”,在学子们的心田里撒播了“管理国家、惠泽民众”的种子。经过半年的收集、增补及完善,由“交大大讲堂”高层学术讲座的主办者——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编的《交大大讲堂①——2008—2009 产业经济前沿与热点》应运问世了。我非常高兴应邀为本书作序。

对于北京交通大学的印象,诸多读者挥之不去的是她经过百余年来的学术积淀和精勤力行,已经成为了信息、管理和交通现代化建设中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的摇篮,成为了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交通建设和改革重大技术与政策问题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学校运输经济学科的蓬勃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经济及物流管理学科实力的强势壮大,使得北京交通大学的产业经济和管理学科作为学校的优势学科,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文社会学科也初步彰显迅猛崛起之势。从历来以理工科见长到工、管、经、理、文、法、哲多学科协调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幸得一批以毕生探索真知、奉献国家、服务社会,且以此为人生最高境界和人生最大乐事并取得了卓越成就的知名学者,如中国技术经济学、中国能源科学技术和物流科学技术领域的著名学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教授,产业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荣朝和教授等;也幸得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李孟刚主任和他的团队,他们以荣校为己任,成就了“交大大讲堂”里的“星光灿烂”,开创了“交大大讲堂”的品牌价值,在交大校园搭建平台,系统地开始对“人文”价值的探索与追寻。这对于学校践行“理工交融,文理渗透”理念,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交大大讲堂”举办期间,亲临现场,座无虚席的会堂、互动交流中的勇敢提问与睿智质疑、讲座结束后主讲人被里三层外三层簇拥着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了:大学之魂,在于求真,在于学术交流与创新;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而大师的号召力源于其深厚的学养。对学术的一份坚持,让众多名师不计酬劳伫立讲台,收获掌声与敬重;对学术的一份渴望,让无数学子甚至席地而坐却如痴如醉,自言从此变得更加富有而深刻。收入本书的讲座实录共计19篇,有对新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对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准确剖析,有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探究与应对策略研究及对中国政府应对举措的理性思考,也有对中国支柱产业——工业和农业及热门产业——房地产业、物流业、保险业、运输业发展的梳理和前景展望等。可以说,从各个层面勾勒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图景。经济,其实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生活在经济的世界里,我们也都在构筑着自己的经济人生。学经济、懂经济以至于“运筹”经济,这是时代对青年的要求。

本书的结集出版，让经济学界及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士和读者，让交大更多的学人，虽未能亲自走进“交大大讲堂”聆听大师们掷地有声的言论，却能同样拥有身临交大大讲堂的幸运。我相信，读者必将欣喜于通过这本书了解经济世界的纷繁百态，必将欣喜于因为这本书有朝一日能站在大师们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我期待着读者通过阅读也能提出办好“交大大讲堂”和出版好“交大大讲堂”系列丛书的建议，祝愿“交大大讲堂”能越办越好，办出品牌，办出影响。

宁 滨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于北京交通大学校园

前 言

2009年2月23日,由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办、以“汇聚名师名家、探索理论前沿、透析产业热点、预测经济发展”为宗旨的“交大大讲堂”高层学术讲座在北京交通大学科学会堂隆重开讲。

在3月7—8日两天的主场学术报告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丁俊发,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物流研究院院长徐寿波院士,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曹玉书,中央党校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新华社经济分析师、经济信息编辑部新华财经分析专线副总监周文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建北京市委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黄石松,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坚,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志国等以其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围绕金融、房地产、物流、农业等热点问题将自己潜心研究所得授之于众,启发学子们敏锐感触时代旋律、独到理解经济现实、深刻思考世情国情。

在4月份精心推出的八场“学术盛宴”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茅于軾先生,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周道许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于鸿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书记、博士生导师金碚研究员,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吴泗宗教授,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立群教授,《环球财经》总编辑、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向松祚教授等也走进“交大大讲堂”,解读当前形势,评析经济政策。讲堂之上,学者口吐莲花,激扬思想;讲堂之下,听众座无虚席,如沐春风,或点头称是,或锁眉质疑。精彩之处,场下掌声雷动;诙谐之处,场下笑声如云。学子们感言,能和先生们一样站立高处看世界经济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好不痛快!“交大大讲堂”里智慧的声音和思想的光芒,让他们在“乱花迷眼”的严峻经济形势下豁然开朗,找到了奋进与前行的力量;演讲者的人格魅力和大师风范,更为他们提供了治学、为人的参照和榜样。

25场高层学术讲座,共计5000余人次听众,使“交大大讲堂”逐渐成长为一个富有价值的品牌;“交大大讲堂”也已经成为交大最亮丽的风景,不仅增加了这块留下了交大人成长脚印的土地的内涵,而且让这个百年老校更加生机盎然、青春焕发。

大师们的演讲可谓掷地有声、字字雪亮,为了让更多的受众能得益于此,为了让这

些思想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将收录到的19篇学术报告内容结集出版。在整理和编辑的过程中，不少演讲者在讲座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了近期研究的得意成果，更不乏大师将自己多年心血凝练的研究精髓提供给我们，使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和翔实，更具可读性和参考性。学者们深厚的学养无疑让我们钦羡不已，而其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及给予本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更让我们深深地感动。

尽管我们的“交大大讲堂”还很年轻，尽管我们的《交大大讲堂①——2008—2009产业经济前沿与热点》还有不少遗憾之处，但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日子里用心奉献出更多生动的、深刻的、先锋的、睿智的精品；将这面崇尚学术的大旗在北京交通大学的校园里坚定地扛下去，直到永远。衷心地希望通过本书这个和大师对话的平台，广大读者能深谙经济世界的格局变迁，唤起内心深处也许封存已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铭记于心并恪守一生，将坚持真理和尊重知识的薪火代代承传。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
2009年11月

目 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	柳斌杰 (1)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金融产业安全	郑新立 (8)
抢抓机遇 真抓实干 全面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	刘燕华 (15)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	李慎明 (20)
物流产业发展理论前沿	徐寿波 (28)
关于沪宁城际铁路功能定位与通道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考	荣朝和 (68)
我国自主研发的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	赵 坚 (78)
市场经济中的非自利因素: 责任感	茅于軾 (95)
打造准确“报时”的领导管理系统	金志国 (101)
快速发展的中国物流业	丁俊发 (104)
防范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的潜在风险	曹玉书 (12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微观机理、制度根源、应对策略	吴念鲁 (131)
中国工业发展 60 年: 解放、变革、振兴	金 碚 (146)
我国保险业的改革发展	周道许 (161)
上海提升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能级对策研究	吴泗宗 邵长斌 (181)
失衡与重构	黄石松 (197)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战略部署	曾业松 (209)
谁解释了金融危机和大萧条?	向松祚 (223)
2009 年房地产市场可能呈现“前跌后稳”的趋势	周文龙 吴凡夫 李榛蓁 胡 铃 (233)
后记	(248)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柳斌杰



柳斌杰，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曾先后任冶金部白银公司工段长、矿长、党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四川省省长助理，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省政府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

柳斌杰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的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硕士，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不仅具有丰富的党政工作和经济工作经验，而且在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真理的具体性、认识史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问题的研究，80年代关于人的现代化、公民素质、道德、理想和科学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90年代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21世纪初关于国家意识形态、新闻出版制度、中国文化复兴之路、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上，都有很多创新，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专著。

柳斌杰教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者，也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业内外享有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敢于开拓创新的盛誉。他是《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主要制定者，是我国大力发展传播技术和“新媒体”政策的推动者，主持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等多项国家重大课题。近年发表了《新闻出版业的机遇与挑战》、《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及其他》等100余篇学术论文，主要专著有《现代国民素质论》、《中国的外交哲学》、《人类进步的旗帜》、《文化力论》、《WTO协议解读》等。

十七大以来,全国各地许多省市、单位都开展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目前,思想解放的高潮正在深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与三十年前的“解放思想”有什么不同?今天的“解放思想”是在一个什么起点上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要求是什么?任务是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对十七大之后中国历史方位的一个判断,现在“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围绕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围绕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思想解放。它有不同的思想内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任务和目标。这也正是此次在全国兴起的解放思想与三十年前的解放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解放思想的新起点

(一) 要说明在新起点上“解放思想”首先要说明“解放思想”的新起点

应该说,每一次“解放思想”都是面对当时的形式、任务和要求。

中国历史上,大的“解放思想”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次,那是在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即将确立、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要求下形成的“解放思想”的局面,当时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创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今天看到的许多历史典籍都示喻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次“思想解放”。从此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延续了几千年。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救国救民的先知也开始讨论如何结束中国的封建社会、赶上世界潮流。特别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用西学来解决问题的民族思想的产生,带来了中国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事件一般认为在五四运动时。事实上,五四运动十多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解放思想”的高潮,那就是办报纸办刊物,是中国历史上新的解放高潮。今天看到的这种思潮在这个时期都已经有过,其中像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的一种,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占到主导地位。当时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称为主义的学派有20多个,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最主要的学派是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这些思想一开始占主导地位。到了五四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开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因此可以说,那时候中国人民做出了重要的选择,在众多学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政治派别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众多道路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那次思想解放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选定了我们今天的方向。因此说,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类的选择,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选择过程,在并非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渐成为了主导。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前一次的解放结束了奴隶社会,转向了封建社会;后一次的解放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始向民族主义制度转变,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逐渐转变到新民主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有几次重要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

动，彻底结束了中国的革命由外国指导的模式，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支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导。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思想没有解放！我们只是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照搬过来。结果出现了两个“行不通”：一是，中国的反动派占据了城市的中心，革命的力量比较弱小，城市暴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二是，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发展起来，中国最大的力量是农民，革命必须依靠农民。这两大问题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时就需要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把农民改造成工人阶级，而这是共产国际不承认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思想入党的方法，提出农民虽然不是工人的身份，但经过思想教育具备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样能成为先锋队的一员，解决了革命的力量问题。而由农村包围城市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没有这一思想解放，中国的革命没有希望。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当时，由于照搬外国的一些经验，加上我们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过于严重，把阶级斗争看得高于一切，时刻关心政权稳固问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至于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这一次的解放思想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出路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必须要改革开放。在小平同志的总体设计下，首先从农村突破，逐渐走向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一项一项地推进。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变，全世界的公认，表明中国的模式非常有效。这一套实实在在的模式能够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不在乎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

（二）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是在解决了三大问题基础上的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这是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进步。当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把一切适合各个国家自行探索的一切东西统之叫作修正主义，谁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条条走，可能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真理标准讨论时，之所以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成一个政治运动去搞，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人们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认识不清，把结合本国实践的一些探索当成修正主义，把教条式、理论上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常识解决了大问题，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是发展的，是结合每个国家实践的，中国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改革前十年，步伐总是迈不开，姓社姓资的问题当时一直突破不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不清楚！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不敢用，社会主义不好的东西也不敢丢，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改革问题非常艰难。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就是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作了明确的判断，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姓社姓资不是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从而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我们才把市场经济体制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大推进了整个体制改革及各方面的改革。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姓公姓私的问题。公有制、私有制之间存在一个鸿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将二者融合起来，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大问题。“三个代表”理论就是着重于解决这个问题。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公有制有其特殊的实现形式，私有制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形式。不是只有实现人民公社化、国家办企业才叫公有制。党的十五大打破了这个狭隘的界限，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国家所有的公有制，不再对其他形式的公有制一概否定。

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集中解放思想的关键点。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而不是回过头来再在这个问题上重复。

（三）我们的新起点还要看到实践上的新起点

从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我们注重国家、集体的利益，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今天我们转而把“以人为本”放在了第一位。首先是关注民生，把“以人为本”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同时，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于科学技术的变化也进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联合起来形成的技术群。十年前互联网进入中国时，我们不承认它是一种传播工具、一个信息载体，今天不同了，我们对社会、世界所产生的一切先进的东西都以开放的胸怀去对待接纳，这就是社会逐渐发生深刻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变化。因此，在此基础上想要固守原有的思想，不解放思想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再顽固的人也不能拒绝这样的事实。科学技术历来是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重要杠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这些实践丰富了我们的认识，给我们的解放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四）我们要正确看待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

我们当年所形成的一套思维方式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像帝国主义的封锁、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制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承认我们的国际地位，这些环境是当年我们形成思想观念的一些实践基础。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方面，多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国际问题由一两个大国主宰已经是不可能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主导权越来越大，国际政治舞台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趋势，我们的经济同样也要依赖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过去，中国的经济是封闭的，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现在，石油涨价、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美元汇率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文化方面，多样化也是一个趋势。世界文明形成以来，因文化而发生的战争是最多的，世界上很多大规模战争都是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基督教文化曾经征服过伊斯兰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也曾经统治过基督教文化达百余年。直到今天，文化领域内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西方国家与中东、伊拉克、伊朗之间发生的频繁摩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价值的问题。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是客观现实，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性、独立性越来越强，不可能再用一种文化观念统一所有的人。

因此，我们在文化上奉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政策，对于国外文化不同样式、不同价值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国内产生的各种文化思潮我们予以包容。这种文化的要求对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上述几个方面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在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起点上解放思想，而不是三十年前的解放思想。今天遇到的是今天新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解放思想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也是一个新的历史基点。在新的起点上，解决未来发展的新问题是今天我们解放思想的一个目标。

二、解放思想的新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总结。我们要围绕十七大提出的要求来进行思想解放。具体讲就是：排除一切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思想障碍、机制、体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解放思想，这是一个总的要求。在这方面有几个要点。

（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树立起来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正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理论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术，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问题，实际上这是他从全人类解放的总体观念出发寻求人的解放的一种理论。有一段时期，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称之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而把阶级斗争称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人的问题，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奋斗，我们的革命口号中也一直没有人的概念。科学发展观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现在党和国家各种政策的调整、发展的着眼点都是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与过去只看数据的发展观念完全不同，现在发展的根本目标是看人民群众能不能得到实惠。“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我们一切出发点、落脚点都要为人民着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展的成果要让全体人民享受，这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一切为了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的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就是因为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在处理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经济问题等各种问题中坚持了“以人为本”这种深得人心的思想观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也是我们过去没有提过的

过去我们实行差别发展，有些地方发展好，有些地方还没有发展起来，虽然社会财富越来越多，但贫穷人数也越来越多；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富丽堂皇，农村的状况却越来越糟；一些行业发展了，一些行业却萎缩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教育、文化这些门类的发展同我们的经济发展远远不相协调。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就是因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

基本要求，没有坚持协调发展。社会进步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不能说这一方面进步了，那一方面再进步，这样的社会是不健康、不完全的。我们现在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要把小康社会的建设概括为5个方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五个方面要一起抓，而且都要抓好，这就是全面与协调。再说可持续，可持续发展早在20多年前国际社会就已经提出，当时我们刚刚起步，还谈不上可持续发展。虽然在21世纪国际社会中，中国也是一个强国，但我们并没有落实可持续发展，表现在资源过度的开发和浪费，消耗掉很多不应该消耗的资源，这是一种掠夺式的发展，不能称为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是节约型的、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要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些问题已经提上了我们发展的日程，我们不再是单纯地为了经济数字发展，而是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法是统筹兼顾

就是在做一件事时要考虑到其他事情。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要考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在一个地区发展的时候，要考虑到其他地区；发展城市时，要考虑到农村，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兼顾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法。

三、解放思想的新任务

我们现在的解放思想，除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任务非常艰巨

近两年来不断有一些对改革问题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目前改革产生的许多问题值得重视，甚至以此怀疑在某些领域、某些改革方面是不对的，像教育、卫生就是两个争议比较大的领域。这说明改革在思想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把思想统一到改革开放总方针下，经过了三十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当前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攻坚阶段，改革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显露出来。比如，金融房地产市场的改革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虽然不像美国次贷危机那么严重，但风险依然存在。房地产市场一头是开发商，依赖于银行的贷款，另一头是消费者，也依赖于银行的贷款，两头的风险都在于银行，开发商可以溜掉，消费者也可以赖账，银行却跑不了。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百姓有很好的储蓄习惯，恐怕我们的银行也很难维持下去。因此，如何建立一个规范、可靠的金融市场，如何理顺房地产业，如何为消费者、开发商、银行、投资者建立一个正常的规范，都急需下工夫。这就是我们改革面临的难关和问题。

农村的改革也急需深入。最近国家在林权制度上做了改革，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农村改革的本质问题还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没有解决、农村户口问题没有解决、农产品的政策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服务体系还不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就

成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容易做的事情、改了就见效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都是难干的事情。

（二）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我们举办了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会，获得了举世一致的好评，首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比较完整的形象。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毕竟还很有限。这届奥运会做了一个国家广告，全世界开始对中国有了新认识、新了解。特别是借助于2万多名注册记者、4千多名非注册记者广泛进行宣传报道，以及世界各个国家的官员、运动员来北京实地考察，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宽容、热情、友善、好客的精神风貌，这是好的方面。但从此开始，世界对中国的期望也同样提升，希望中国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融入国际社会。因此，我们今后在对外开放方面还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增加深度，这是必然的选择。能否把奥运会已经形成的一些制度、作风、方式、方法变成我们今后扩大开放的常态，把一个特殊时期的模式变成一种长效机制，是对中国的一个艰巨考验。我们打开的大门已经关不上，已经做到的事情也不可能退回来。但要真正融入世界，我们还缺乏很多方面的准备，好多方面我们还不能和国际接轨，这就是我们目前解放思想面临的新任务。怎样以开放的心态，以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同世界打交道，把奥运会期间的微笑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我们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问题。

（三）面对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我们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

一方面，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触及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现在相当突出，而且越来越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矛盾。我们不怕这些矛盾，问题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解决这些矛盾。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就是要解决这些影响我们发展的矛盾。现在无论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生活领域、文化领域、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矛盾都非常多，而且矛盾总是一个一个接连发生，必须一个一个解决，这就要依靠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办法深入其中，真正的解放思想，打破原来的框架，用一个彻底的办法去化解属于人民整体利益的矛盾，包括老的矛盾、新的矛盾。

（四）改革、开放、稳定是三位一体的大局，现在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我们基本的工作方针

要维护稳定，就要解决十七大提出来的新的“五化”问题，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但同时，“五化”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开拓发展才能解决，不能为了稳定而牺牲发展的要求，也不能因为要搞工业化、城镇化而牺牲了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显然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能够妥善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发展也发展不成，稳定也稳定不下来。这也需要我们思想观念的大转变。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金融产业安全

郑新立



郑新立，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曾在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共撰写 100 多万字的著作和论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全球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国际资本的流动,既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风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建设一个竞争、开放、公正有序的金融体系。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这不仅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积极发挥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作用的客观要求。

一、金融产业的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在依照市场规则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金融体制改革仍然明显滞后于整个改革的进程,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短板。金融产业的发展同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存在着四个明显滞后。

(一) 直接融资严重滞后于间接融资的发展

去年证券市场发展比较好,融资规模增长比较快。但是,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的融资也只有5 600亿元,发行企业债券1 015亿元,直接融资6 600亿元。而去年银行新增贷款3.6万亿元,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是18:82,也就是在企业的资金来源里,直接融资占18%,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占82%。直接融资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改革以来最高年份接近30%的水平。直接融资比重过低,间接融资比重过高,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一是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使银行不堪重负;二是优秀的企业不能以低成本获得资金支持,迅速做大做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优选机制和资金支持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三是广大人民不能从资本市场中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制约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四是企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不能借助于资本市场建立健全起来;五是大企业、优质的企业到海外上市,使中国人不能分享中国优秀企业的发展成果,利润大量流失。所以,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成为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金融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 在直接融资中,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

去年股市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重是85:1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大体为30:70。显然,我国的债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债券市场发展慢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允许东北地区部分国有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偿债机制,一些发债企业仅把这作为脱困的一个出路,并没有很好考虑偿还问题,结果造成上百亿的企业债券到期无法偿还,有的企业甚至理直气壮地要求发新债还旧债。这种状况使得企业债券市场无法持续下去。现在应当总结这个教训。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经过市场中介组织的严格评审,真正对投资者负责,确保发债到时能还,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使债券市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